

■大局

## 被扭曲的中国智慧观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往、交流日益增多日益频繁,这些年来,关于华人是否“聪明”的话题不绝于耳。要论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因为身居蜀中又毗邻武侯祠,笔者想先从诸葛亮说起。

中国民间有“明月照纱窗——个个[格]孔明诸葛亮[格]亮”的歇后语,还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说,足见在国人心目中,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智慧的最高代表。但诸葛亮最终未能逃脱“正统回归”的“政治智慧”寡白。“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的历史局限,就是诸葛亮不顾

时势“百代存亡争正统”的“惟汉室”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不啻一个“失败者”。

诸葛亮何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终成为悲剧人物?“事无巨细必躬亲”实乃个人小过不足为训,传统中国“误入政治歧途”的“泛政治”才是时代大过值得检讨。事实上,智慧如诸葛亮者,吾国历来不乏其人,但却“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在一个“泛政治”的社会,一个人有无智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中三昧”——“忠诚”“权谋”“恩威”,但凡“政治史”上的成功人士,无一不以此三者的“自治”为基础,甚至成为忠诚、权谋、恩威的牺牲品。

“劳心者治人”。智慧,在传统中国不过就是“治人”而已。君不见,堂堂一部《资治通鉴》,前后凡一千三百几十年,通篇皆“治道”二字;而皇皇巨制《二十四史》,上下三四千年,大抵



长期局限在狭窄、偏执中的“圆滑”和“谋算”,严重阻碍中国科技、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 蒋玉磊 制图

也不过历代帝王如何君临天下的皇家史。一个“仕”或“仕途艰险”,就已把这种“泛政治”勾画得淋漓尽致了。否则,任你有多大智慧,只会落荒潦倒,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灭门之灾。这样的例子一个接一个,逐步就形成了一种传统——诸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一慢二看三通过”,诸如“出将入相之术”(过去民间还有一种“升官图”的游戏,“登龙术”或“晒海之术”,更厉害的还有“御君之术”,等等,无不是对这种传统的生动写照。

智慧,在传统中国的“泛政治”社会里,就这样一天天扭曲了。它不再是对客观事物的远见卓识和具象的逻辑分析,不再是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追求,也不再是工艺技术发明创造的能力才干,更不是对经济、人文、社会、制度发展的认识、顺应。智慧,已然“异化”了——为上,要道貌岸然;为下,要八面玲珑;为政,要五羊开泰;为官,要瞒上欺下;为人,要左右逢源;为事,要深沉老练;为文,要不落痕迹;为学,要练达剔透;……从皇权和官僚集权角度看,所谓智慧,就是“驭心牧羊”之术;从文人和布衣平民

角度看,所谓智慧,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扭曲了的智慧观不仅与人性背道而驰,而且压抑人性、扭曲人性;

讲传统,不啻祖述尧舜究章文武;搞研究,必引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做学问,须精熟经史子集;遇新事,动辄得咎无先例;欲探索,惊雷棒喝忌忌讳;……至于科学、技术、工艺、技巧、发明、发现、革新、创造,要么于我何用哉;要么被视同左道旁门奇巧淫技;要么被叱为私欲膨胀甚至狼子野心。至于

关涉制度改革、人文关怀、经济社会、国计民生之类的“发展”问题,更是不能问津,也无人敢越雷池半步,举凡李悝、商鞅、王安石、戊戌“六君子”等等,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于是,“小智慧”变成了个人的“算计”术,“大智慧”变成了寡人的“牧民”术。一个民族的智慧,就这样停滞、僵化、扭曲了。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舍车马,保将帅”“放长线,钓大鱼”“吃小亏,占大便宜”“好汉不吃眼前亏”“忍得一时,免

得一世”“闲事少管,走路伸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类,其实都是这种扭曲了的智慧观的经验总结。

总之,国人的智慧,更多地或集中地体现在为人处事上的“圆滑”和一己之得的“谋算”上;这就是大多数国人的机会主义。总之,这是一种“幽闭恐惧”的内斗、内耗;不用生产、创造,而直接谋占他人和社会的资源。

有人说,这是国人的精灵、聪明。其实不然。这种个体的“理性”,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反理性,使国人的智慧长期局限在一个狭窄、偏执甚至疯狂的变态状况中,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科技、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国人的勤劳、聪明,历朝历代的发明创造之所以没有能够突破资源硬约束,其根源就在“泛政治”。从这个角度讲,上海版历史教科书以“全球史观”的胆识和气度,跳出“历史——政治史”宿命,回到物质的历史、生活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或许,这将是国人告别“泛政治”而回归智慧真谛所迈出的智慧一步。

■德鲁克在中国

## 半块面包可以半个婴儿就糟了

——决策妥协的底线



◎黄建东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培训总监

在决策过程中,要是被诸如“老板能接受什么样的决策?”、“我知道我现在怎么做才能迎合他们的心意呢?”、“我知道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相信的东西相矛盾,我们该如何慢慢地,在小范围内起步,以免惊动太多的人?”之类问题所困扰,决策肯定会失败。

这是德鲁克通过他本人的教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二战之后,公司变革正迫在眉睫。他接到一个大型咨询项目,向通用汽车公司建议变革方案。写完报告后他就开始担心。一会儿是雪佛兰的人说,他们不喜欢这条,他就把这条删掉了;一会儿劳动关系部门的人说不喜欢那条,他又放弃了那条建议;设计部门坚持对汽车采取统一的设计,虽然市场调查表明,统一的设计风格并不受美国公众欢迎,但最后还是把这一条建议改得模棱两可。

结果,他的报告没能说服雪佛兰公司、劳动关系部门或者设计部门的人改变想法,这些人也没有人支持他。

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把德鲁克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他说:“德鲁克先生,通用汽车公司有很多副总裁,他们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能够根据需要做各种妥协,不需要顾问去劝说他们。”

德鲁克记住了老斯隆的这句话。之后,他做决策时,再也不被“谁会喜欢”或者“谁会不喜欢”之类的问题所困扰,他首先会想好什么是正确的决策。

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决策”是做出有效决策的一个出发点。当然,最终妥协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妥协之前,决策者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妥协,什么是错误的、不能接受的妥协。

“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这句谚语可以用来形容正确的妥协;错误的妥协可以用圣经故事中《所罗门

的判决》来形容:“与其要半个婴儿,还不如不要婴儿”。卓有成效的决策者事先就要想好,什么样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半块面包”,什么样的妥协就像那“半个婴儿”,比根本不做决策还要糟糕。

要这样做,首先需要明确界定问题,然后将有效决策的具体细节写下来。比如一个决策怎样才能解决问题?不管要做什么妥协,只要一个方案能够解决问题——尽管可能解决得不够完美——这种妥协就是正确的妥协。如果妥协不能解决问题,这种妥协就是错误的,这个方案可能不做决策更有害。

在中国,“妥协”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好像总是屈辱性的“城下之盟”。这是一种偏见。在传统的等级制森严的社会中,弱小者为了生存,是需要经常做出屈辱性的妥协。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小到人际关系的处理,大到政府政策的出台,乃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都必然有妥协。比如说,在争执中,为了尊重对方的尊严而做出的让步,绝不能视为妥协。在企业决策中,特别是在与他人合作时,管理者也应该以妥协的思维方式争取持久的双赢或多赢的局面。妥协的思维,对企业持续的战略优势,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在决策中,“妥协”是一个不可避免考虑因素。但是,管理者决策时,不能首先考虑妥协。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如果管理者在决策中仅仅是考虑了某项决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可能这个决策贯彻不下去,因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决策所影响的方方面面,某项决策“应该是什么样的”与某项决策“实际是怎么样的”之间肯定存在差距。这里的关键是在“妥协”的时候一定要守住“底线”,也就是德鲁克在决策的要素中讲到的“边界条件”。

■生活财思

## 所有权有时是个童话



◎林采宜

中国银联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专家委员会委员

林语堂《京华烟云》有一个片断,姚家为逃避战乱,将古玩埋在院子地下,木兰问父亲,这些宝贝“要是被别人掘走了怎么办?”姚老爷说:“周朝的古董,传到现在,历经三千年,中间辗转了几百个主人,谁能永远占有呢?”

是,一样东西,它在你的手里,是缘分,人生有限,任何一款奇珍异宝与主人的归属关系都是短暂的。

用历史的长镜头去扫描,所有权有时候只是一个童话。

一代名士张伯驹平生酷爱古玩字画,倾家荡产收藏珍品,最后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国家。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身后将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全球第二富豪、拥有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75岁时宣布将其85%的个人财产——370亿美元捐赠给美国五家慈善基金会,其中30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创美国有史以来个人慈善捐款额之最。

盖茨、巴菲特和张伯驹们的捐赠本质上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生命的美好与否区别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局,任何形式的财富都是流动的,捐赠行为使之归所应归之处。

从记事开始,我们就渴望“拥有”,拥有布娃娃、玩具枪,拥有小人书和小皮球,拥有糖果和奖状,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当“拥有”和财富挂钩,这个动词后面的内容,似乎是多多益善,不仅包括物质,同时也包括权力或者别的什么,大多数人在渴望“拥有”的期冀中长大。

小时候看见祖母给服装厂做女工,戴着老花镜,针线在她的磨上磨出厚厚的一层,挣来的钱十块、五块地存进一本薄薄的红皮存折。1998年她去世时,折子上有一万多元存款,叔叔拿出全部用于办丧事。省吃俭用一辈子,只为拥有一分让自己心安的积蓄,而最后,却在一夜之间全部化在道士、尼姑的吹拉弹唱当中。出殡那天,整条街的街坊邻居都过来吃豆腐饭,望着十几桌席上举杯挥箸的邻居和亲戚们,我想,如果祖母当年不去为存

折上的数字努力,那么她这一辈子的饭桌上或许顿顿都会有鲜美的排骨汤以及新鲜的草鸡蛋。可是最后这些积累下来的财富都变成了一路挥扬的冥钱和一块看似奢侈的墓碑。

20多年前,为了省一点点钱,祖母曾经含辛茹苦,把自己原本可以很滋润的人生省俭成无数个皱巴巴的日子。让人悲哀的是,20多年后,仍然有许多家庭省吃俭用,把本来尚可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压榨成锱铢必较和风雨兼程的艰辛,为的只是拥有一套两居室或者三居室的商品房。

所有权,让一些人成为财奴,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房奴。

当我接过祖母作为遗物传给我的戒指和项链,那些黄灿灿的劳什子除了扔在抽屉里做先人纪念品外,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同理,二三十年后,更年轻的一代人面对这些设施落伍、陈旧不堪的简陋建筑,会如何感慨他们曾经为“高价”商品房付出沉重代价的长辈?

对于房奴现象,我有一位朋友的话:“租来的房子也是家,租来的生活也是生活。”

的确,人生短暂,有时候,享用比拥有更为重要。租几套婚房足以让新娘在婚礼上光彩夺目,而拥有几套婚房会让你衣柜一辈子拥挤不堪。在不同阶段,租不同的房子住会让人体会到不同的生活氛围和自然环境,但在不同的区域买几套不同风格的房子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恐怕要让出自己的财务收支从“百万富翁”走向“千万富翁”。

所有权不过是个童话,但这个童话有时候伴随我们一生,让我们变为房奴。毕竟,生活中有太多的人牺牲了实实在在的“享用”去支付对所有权“拥有”。

我们果真需要“拥有”那么多东西的所有权吗?不以人生的有限而言,更重要的是利用和享用,而不是对产权的占有。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没有一样物质的归属关系是永久的,“所有权”只是界定了经济生活中的理性秩序。

网络时代,当“财富积累和时间成正比”的金科玉律被打破,财富的蒸发和时间当然也不再成正比,暴富和破产似乎都是一夜间的故事。

对于个人而言,财物的真正价值在于使用而不是占有。盖茨明白这点,巴菲特明白这点,不知道那些为“拥有”所有权而含辛茹苦的朋友们是否也明白?

■求索

## 高通掌门人项庄舞剑



◎陈宇峰

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  
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项庄舞剑,以解燃眉之急。他说,“在TD-SCDMA方面,我们在与相关参与机构和厂商探讨,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我们能够作为TD的发展做哪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全力投入。”虽然他暂未表态认可中国在TD-SCDMA上拥有核心专利,但他的种种迹象表明,高通不愿放弃中国的3G市场,保罗·雅格布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拯救他以及高通命运的一个赌注。

要知道,2004年2月,代表中国厂商利益并接受政府委托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便开始与高通公司谈判WCDMA的专利费。但是,谈判因高通公司高调拒绝降低专利费而搁浅。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和资金自主研发。后进者的追赶之势,引发美国高通市场策略的转变。2006年,在CDMA与GSM两大3G阵营的角逐中,高通不仅一改从前的傲慢态度,而且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快速提升。2006年3月,高通启动与德信无线科技深度合作,主要专注于对无线终端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以及测试,3GCDMA将是其首要研发方向。很显然,雅格布现行的中国市场策略不仅避而不谈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企图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进入中国CDMA的主流市场之中。

最近,雅格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伸出了他的“橄榄枝”,希望在全球通信市场萎靡不振时,从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上分得一

杯羹,以解燃眉之急。他说,“在TD-SCDMA方面,我们在与相关参与机构和厂商探讨,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我们能够作为TD的发展做哪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全力投入。”虽然他暂未表态认可中国在TD-SCDMA上拥有核心专利,但他的种种迹象表明,高通不愿放弃中国的3G市场,保罗·雅格布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拯救他以及高通命运的一个赌注。

要知道,2004年2月,代表中国厂商利益并接受政府委托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便开始与高通公司谈判WCDMA的专利费。但是,谈判因高通公司高调拒绝降低专利费而搁浅。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和资金自主研发。后进者的追赶之势,引发美国高通市场策略的转变。2006年,在CDMA与GSM两大3G阵营的角逐中,高通不仅一改从前的傲慢态度,而且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快速提升。2006年3月,高通启动与德信无线科技深度合作,主要专注于对无线终端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以及测试,3GCDMA将是其首要研发方向。很显然,雅格布现行的中国市场策略不仅避而不谈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企图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进入中国CDMA的主流市场之中。

最近,雅格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伸出了他的“橄榄枝”,希望在全球通信市场萎靡不振时,从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上分得一

杯羹,以解燃眉之急。他说,“在TD-SCDMA方面,我们在与相关参与机构和厂商探讨,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我们能够作为TD的发展做哪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全力投入。”虽然他暂未表态认可中国在TD-SCDMA上拥有核心专利,但他的种种迹象表明,高通不愿放弃中国的3G市场,保罗·雅格布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拯救他以及高通命运的一个赌注。

要知道,2004年2月,代表中国厂商利益并接受政府委托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便开始与高通公司谈判WCDMA的专利费。但是,谈判因高通公司高调拒绝降低专利费而搁浅。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和资金自主研发。后进者的追赶之势,引发美国高通市场策略的转变。2006年,在CDMA与GSM两大3G阵营的角逐中,高通不仅一改从前的傲慢态度,而且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快速提升。2006年3月,高通启动与德信无线科技深度合作,主要专注于对无线终端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以及测试,3GCDMA将是其首要研发方向。很显然,雅格布现行的中国市场策略不仅避而不谈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企图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进入中国CDMA的主流市场之中。

最近,雅格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伸出了他的“橄榄枝”,希望在全球通信市场萎靡不振时,从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上分得一

杯羹,以解燃眉之急。他说,“在TD-SCDMA方面,我们在与相关参与机构和厂商探讨,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我们能够作为TD的发展做哪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全力投入。”虽然他暂未表态认可中国在TD-SCDMA上拥有核心专利,但他的种种迹象表明,高通不愿放弃中国的3G市场,保罗·雅格布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拯救他以及高通命运的一个赌注。

要知道,2004年2月,代表中国厂商利益并接受政府委托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便开始与高通公司谈判WCDMA的专利费。但是,谈判因高通公司高调拒绝降低专利费而搁浅。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和资金自主研发。后进者的追赶之势,引发美国高通市场策略的转变。2006年,在CDMA与GSM两大3G阵营的角逐中,高通不仅一改从前的傲慢态度,而且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快速提升。2006年3月,高通启动与德信无线科技深度合作,主要专注于对无线终端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以及测试,3GCDMA将是其首要研发方向。很显然,雅格布现行的中国市场策略不仅避而不谈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企图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进入中国CDMA的主流市场之中。

最近,雅格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伸出了他的“橄榄枝”,希望在全球通信市场萎靡不振时,从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上分得一

杯羹,以解燃眉之急。他说,“在TD-SCDMA方面,我们在与相关参与机构和厂商探讨,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我们能够作为TD的发展做哪些工作,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全力投入。”虽然他暂未表态认可中国在TD-SCDMA上拥有核心专利,但他的种种迹象表明,高通不愿放弃中国的3G市场,保罗·雅格布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拯救他以及高通命运的一个赌注。

要知道,2004年2月,代表中国厂商利益并接受政府委托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便开始与高通公司谈判WCDMA的专利费。但是,谈判因高通公司高调拒绝降低专利费而搁浅。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和资金自主研发。后进者的追赶之势,引发美国高通市场策略的转变。2006年,在CDMA与GSM两大3G阵营的角逐中,高通不仅一改从前的傲慢态度,而且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其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快速提升。2006年3月,高通启动与德信无线科技深度合作,主要专注于对无线终端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以及测试,3GCDMA将是其首要研发方向。很显然,雅格布现行的中国市场策略不仅避而不谈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企图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进入中国CDMA的主流市场之中。

最近,雅格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伸出了他的“橄榄枝”,希望在全球通信市场萎靡不振时,从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上分得一

■彼岸

## 非洲更需没有媒体效应的援助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世人都知艾滋病是流行于非洲大陆的致命疾病,但另一个每年夺去100万非洲人生命的疾病却在媒体上很少提到;疟疾,这是一种非常平常的蚊子叮咬传染的疾病,受害者主要是5岁以下的儿童。

近些年来,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投入并承诺了数百亿美元援助与艾滋病斗争,虽然没有得到如艾滋病那样多的媒体注意,美国也在帮助非洲预防疟疾的传播。去年12月,布什总统夫妇组织了一次帮助非洲预防和治疗疟疾的高峰会议,参加的人员除了政府要员外,还有盖茨夫人那样的民间慈善家。其实,早在2005年,布什就承诺12亿美元的5年计划,在非洲的15个国家防治疟疾。过去的几年,在国家社会的支持下,非洲国家在防治疟疾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据最近美国《世界》杂志报道,以非洲一个小岛Pemba为例,去年一年疟疾的发病率下降了87%,去年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一家一户的去喷洒杀虫剂与发放蚊帐。

就在那个高峰会议上,布什强调帮助非洲与艾滋病以及疟疾斗争是马歇尔计划后最大的援助计划。布什将援助非洲防治艾滋病,疟疾与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是因为艾滋病、疟疾等不仅威胁非洲人的生命,而且在经济上有深远影响,比如单单疟疾所导致的死亡,在劳动力量上就给非洲带来120亿美元的损失,非洲原本就脆弱的经济又反过来影响对疾病的防治。非洲经济的崛起,不能只靠经济援助,最终要靠非洲人自己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如果不能控制疟疾等疾病,非洲的经济根本不能向好的方面转变。

毋庸置疑,布什当政的6年多来,美国向非洲投入大笔的资金去与疾病斗争,鲜为人知的是,布什比克林顿向非洲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从国际媒体上,人们知道的就是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对非洲在与疾病作

斗争上给予的巨大的帮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的一些名人尤其是好莱坞明星们很热心地为非洲防治艾滋病做慈善工作,除了他们也可能有爱心外,更因为听了公共关系专家的指导,因为支持非洲与艾滋病斗争是更加高尚的使命,能够得到更多的媒体赞扬,这无疑是一种慈善事业上的公关计算。

前段时间,美国当红性感明星麦当娜到非洲的某地方过继一个孩子,媒体大肆宣传,新闻电视全程跟踪报道过继过程。据说,考虑到所有的开支,包括麦当娜一行的路费等等,过继一个孩子的费用高得惊人,而被过继的孩子就像是中了六合彩。许多美国人则对此很不以为然,为什么不把在过继一个孩子上的花费投入到非洲当地改善环境上去呢?比如,当地的非洲人连干净的饮用水都喝不上,拿这笔钱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净水系统不更好吗?非洲的贫穷地区需要的是环境和经济自立上的帮助,而不是到那去抱一个孩子来过百万富翁般的生活。

援助非洲的防治疾病,美国一些慈善基金也有不小的投入,比如盖茨基金,它不只是在曝光度高的防治艾滋病,也关注包括如疟疾那样的普通疾病。盖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非洲有一些致命的病在其他国家已经不是什么疾病了,因此按市场规律办事的医药公司并不生产那些疫苗和药品,只有靠慈善基金等非市场投入去研制和生产。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盖茨基金与麦当娜过继非洲婴儿的不同。

非洲需要帮助,需要防治疟疾那样没有多少媒体效益的帮助。